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

汪振城 主编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10HQZW05]

身体政治： 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

张彩虹◎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

汪振城 主编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10HQZW05]

身体政治： 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

张彩虹◎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 / 张彩虹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12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 / 汪振城主编)
ISBN 978-7-5043-6581-1

I. ①身… II. ①张… III. ①女性—电影演员—人体
美—研究—中国 IV. ①B834.3②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4995 号

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

张彩虹 著

责任编辑 毛冬梅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6(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581-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彭少健 项仲平

主 编 汪振城

副主编 陈林彬 吴荣生 卢 炜 陈 斌

绪 论	对象与方法	1
第一章	身体意象与电影	13
第一节	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与身体话语	13
第二节	电影女明星——身体政治的读解符码	20
第二章	女性意识的更生：1920年代的银幕女郎	30
第一节	女体的苏醒	30
第二节	女性登台：舞台与银幕上的女体展示	46
第三节	电影女明星的诞生	50
第四节	传统与现代的渐变	56
第三章	视域分野：1930年代的新旧两派电影女明星	68
第一节	都市空间的拓展和女性意识的进一步现代化	70
第二节	胡蝶：传统审美意象的表征	81
第三节	徘徊在新旧意识之间的阮玲玉	89
第四节	新兴电影运动中的新女性	98
第五节	好莱坞热女郎的新发展	110
第四章	时局动荡与意识分流：1940年代的女性影像	115
第一节	孤岛电影与日常生活美学	116
第二节	身体歌喉家国：周璇、白光和作为“他者”的李香兰	124
第三节	抒发人文气质和政治情怀的战后电影女明星	132

第五章	祛魅的身体：十七年和“文革”电影中的性别缺席	141
第一节	新中国电影身体美学的重建	142
第二节	身体改造与银幕放逐：旧上海电影女明星的新选择	151
第三节	红旗下的新生代	167
第六章	趋魅的身体：新时期以来作为献祭与消费符号的女体	185
第一节	归去来兮：身体放逐与个性解放	188
第二节	文化反思的软着陆：巩俐的90年代	211
第三节	消费文化的视觉饕宴：新世纪与章子怡的花样年华	227
第七章	漂浮的能指	247
第一节	家国天下与身体呈现	247
第二节	在物化中寻求主体重塑	255
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72

绪论 对象与方法

本书以百年来中国电影女明星的身体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中国电影女明星，绕不开“身体政治”（Politics of The Body）这一核心命题。身体理论是近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低贱的、形而下的、长期处于无名状态的身体，直到19世纪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兴起后，才开始进入形而上的思考范畴，并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从推翻理性逻各斯的目的出发，尼采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把人看作身体的存在。这一身体本体论的大胆命题推翻了长达两千年以来的主体哲学，人不再是柏拉图智慧的存在、基督教经院哲学信仰的存在、启蒙主义理性的存在，而是身体的存在，抛弃了意识头颅的身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而弗洛伊德对性的分析也揭示了肉身的重要性。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对弗洛伊德哲学对身体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不管哲学上如何表述，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已经最好地洞察到了身体的精神功能与精神的肉身化。”^①同时他所开创的身体现象学也提出对世界的释义要从身体开始。他把人看作是某种“灵性化的身体”或者“肉身化主体”，内在心灵通过身体外在化了。而“肉身化主体”正是梅洛·庞蒂哲学的核心。在其后期残篇《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更是把身体提升到了世界本体的地位。他发现“身体不再是处于某个超然的精神视野之内的一个

^① Merleau - ponty, Signes, Edition Garlimard. 1964. p287.



在世界中的客体，而是处于主体一边，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视点，是精神借以呈现出某种自然和历史处境的地方”。^①但是，本书指涉的核心词汇“身体政治”还要从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一系列著作中进行解读。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身体哲学，追述了身体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遭遇，揭示了压制身体的包含了文化、政治与经济在内的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实践、话语和技术被烙印或铭刻在身体之上。在福柯看来，“身体政治”就是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所有身体实施的管理与规训；那些拒不服从者将受到权力的公开惩罚。^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性史》、《文明与癫狂》、《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大大拓展了身体理论的研究深度，并引发当代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兴趣。“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③。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的历史。然而长久以来，身体一直处于意识的附属地位，在敞开与遮蔽之间尽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强加其上的“规训”痕迹，“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④福柯发现，很多时候，身体并不是尼采所谓的具有主动性的身体，不是权力意志的代表，而是被动地充当了被历史铭写的场域。权力与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⑤在福柯那里，身体不再具有尼采所谓的动物性的冲力，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欲望也不可能像吉尔·德勒兹和乔治·巴塔耶所预期的那样建立其“欲望政治学”的领域，“被动的身体最终出路只能是隐秘的自我美学改造：身体不是根据它自身的主动力量展开，而是根据美学目标来自我发明”。^⑥这种改造的标准一开始是沿着福柯所说的道德与法律的路线行进，在一如既往地将政治附加在身体之上的同时，身体的附属物——性，也在17世纪以来成

① Merleau - ponty, *Parcours Deux*1951 - 1961, Editions Verdier, 2000. p21.

② 肖学周：《身体能否摆脱政治》，《文汇报》2006年6月。

③ Michea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 - Memory, Practice*, Bouchard, 1981, p148.

④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页。

⑤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页。

⑥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9页。

为一种禁忌话语。进入 20 世纪之后，身体的处境开始随着视觉文化的来临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其中由性而生的欲望成为附加在身体上的新主宰，20 世纪末，进一步演化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消费当道的美学标准。尼采的主动的身体与福柯的被动的身体，都是人类处于物质匮乏的生产主义时代的身体状况，而当下流行的消费主义时代，身体的处境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尼采投向主体哲学的一把利刃，也不再是福柯被权力铭刻、改造的对象，而是成为视觉消费的重要对象。20 世纪中后期，成为文化研究核心词汇的身体理论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考维度前行。本书对百年来中国电影女明星在早期中国电影和新中国电影这两大历史时段身体处境的考察，也是按照相似的理论维度进行阐发的。

对于明星研究来说，20 世纪中后期，哲学中有关身体的争论开启了明星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路和方向。电影明星的身体因此成为解说“身体政治”的范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电影明星“不只是物质实体、生物数据或是生理学事实，从某种真实和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它是一种社会建构”^①。而“身体政治”所揭示出来的身体的处境与遭遇，又成为“明星研究”中解读电影明星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构成的有力武器。19 世纪末传统理性哲学走到了历史的拐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泛滥开启了人类被压抑的潜意识领域的潘多拉之盒。弗洛伊德主义的盛行使欲望成为消费主义的发动机。作为视觉文化的典范，电影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随着照相术的发明、视觉文化开始走向鼎盛时期出现的。银幕上最初的风景区与时事新闻不久就被故事中的身体取代，从无足轻重的故事构成元素开始，银幕上的身体经历了一个从“无名”到“有名”的命名过程。身体与它的影像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作为身体在银幕上的投射，电影明星的形象同样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和培养起来的。保罗·谢尔德（Paul Schilder，1886—1940）在 1935 年出版的《人体的形象与外表》一书中指出，对身体形象的考察可以从其生理基础、力比多结构和身体形象的社会学三个层面着手。他认为，身体形象必定是社会的，身体形象的所有方面都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和培养的。凭借身体形象出位的电影明星也是社会建构和培养的产物。作为明星，单数状态的个体身体不可避免地要被福柯所谓的复数状态的社会身体所取代。作为社会身体建构的一种方式，电影演

^① 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7 页。



员在银幕上的表演也体现了身体在世的两重性。一方面电影明星的身体具有作为个人的独特性和私密性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镜像结构与欲望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时它更是社会合力的作用场域。

以身体影像的银幕呈现为中心的电影明星研究，存在着真实身体、镜像身体和社会身体的互相交织的身体影像的“互文本场”。明星研究中，对明星的定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作为商品的明星（star as commodity），作为文本的明星（star as text），作为欲望客体的明星（star as object of desire）。^①这三种存在模式都与电影明星的身体表演有着内在相关性。第一种模式注重对明星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探讨，稳定的明星制度能够为流水线操作的电影产业带来可以预期的市场和票房，为影片的投融资、制作、发行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正是明星的类型化形象培养了固定的观众群，培养了忠诚的粉丝团体。第二种研究模式中，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的一系列著作堪称典范。出版于1975年的《明星论》中提出的理念成为后人在这—领域不断引用的范本。戴尔认为，明星是由两个层面的形象构成的：公众形象与私人形象。首先对应于私人形象的是一个真实的个体，它们具有真实的姓名、形体、声音和独特的演技。但是明星的这一面却很少为人所知，明星的“公众形象”才是公众最为熟悉的。明星的公众形象是由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道德诉求的社会审美观以及与此相匹配的由观众趣味所构成的市场需求不断包装、改造的产物。在此基础上，R. 科尔多瓦总结道：“出现于故事片中的形体实际上处于一种多义的、复杂的状态：在任何时刻，人们在理论上都能在一个形体中找到两个形体：一个制造出来的形体（人物的形体）和一个制造者的形体（演员的形体）。把注意力集中在前者身上，观众便投入虚构的人物形象。把注意力集中到后者身上，观众就会进入一条互本文性质的特定路径，它一直伸向作为形式系统的本文之外。”^②这种符号化了的明星形象由此成为戴尔所谓的“被结构的歧义体”。对它意义的阐释必须兼顾影片的促销文本、影星的宣传文本、影片文本和电影批评文本等诸多方面。在这些互相纠结的文本中，突出呈现的仍然是电影明星经过改造与修饰的身体表演。第三种研究模式中，明星被看作是欲望的载体。不同类型的明星具有不同的形体特征，丰满与性感相连，纤细与文雅婉约相伴，而强壮又

① 陈犀禾、徐文明编译：《连载一：明星研究》（上），《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② R. 科尔多瓦：《明星制的起源》，肖模译，载《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

与勃发的英雄气概画上等号。类型化的身体形象和气质使明星在银幕上的角色形象也随之定型化，成为某一类欲望投射和心理诉求的替代物。“身体的魅力是造就明星的前提，他们均是身体表演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星崇拜的巨大冲动背后隐藏了强大的原始情绪。无论如何，身体影像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符号。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发现的那样，明星的才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占据了明星的位置，才能不过是这个位置的必然附属品，因此，明星仅仅是一个‘活动的符号’。”^① 作为活动符号的明星，被分门别类地贴上各式商品化的标签，“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内与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明星属于现代的、世俗的肖像（icons），是公众从其舞台与银幕之上——与之外——的虚构外貌与表演中产生的种种理想与价值的化身。”^②

从上述路径来看，本书所涉及的是以身体理论研究中国百年电影女明星问题的研究范畴。其中既有身体政治的主线，又有明星研究的范式，更有女性主义的视点涉猎，视觉文化对女体的消费。因此，在对本书所主要采纳的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之后，有必要回溯一下明星研究的各种已有范式。在西方，明星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框架和体系。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批评等是其经常采用的理论“武器”。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态势：

一、对明星社会地位的研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的一系列著作与研究方法成为这一研究流派的鼻祖。他的代表作《明星研究》、《神圣的身体：电影明星与社会》（*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1986）等从作为银幕形象和社会符号的双重角度对明星进行了“互文本”的考察，成为明星研究的典范之作。

二、明星文化意义的研究。斯蒂芬·海勒曼《明星文化》（*Stephen Hinerman. Star Culture*）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它着重从“全球性媒体明星的限定因素”、“名声与历史中的传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时间、空间与明星”、“明星与信任”、“明星生产论”、“明星制”、“消费明星”、“影迷身份认同”等方面考察了明星研究的各个方面。

^① 南帆：《身体的叙事》，载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②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三、对明星身体及其表演的研究。“一种社会上主要的政治问题都反映在身体上，而且通过身体来表达”。布莱恩·S. 特勒在其《身体和社会》（1996）和伊冯尼·塔斯克《身体景观：性别，类型和动作片》（1993）等书中把动作片明星的身体看作是某一时代文化的具体表现。瓦伦汀·尼克拉维柯·沃罗希洛夫把身体的表现潜力称为“意识形态的产物”。

四、对明星符号意义的研究。从观看学角度来研究明星的符号意义，是当代西方明星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1975）一文开创了明星研究中的观看学视角。她从女性主义立场指出，古典叙事电影根据男性异性恋者的欲望来设定观看方式，总是把女性当作景观置于被观看的中心位置。

五、对明星职业工作及与其关联的明星制度的研究。巴里·金在《区别明星现象》一文指出限制明星的经济权利是基于演员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的，可见明星制度受到非明星演员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艾曼纽尔·列维《民主精英：美国电影明星》（1989）一文指出明星制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表演的平等主义主张——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明星——和它的分层结构——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成为明星。”

六、对影迷及其文化的研究。约翰·费斯克《影迷学文化经济》（1992）提出“影子文化经济”（shadow cultural economy）概念。亨利·金肯斯（Henry Jenkins）认为将影迷视为缺乏控制或有权力控制明星的对象，而他们又为更有权力的媒介机构所控制。影迷们在他们所选择的媒介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某些时候，一些影迷利用他们选择的文本去建构可选择的世界观以及象征性地抵抗了它的统治体系和权力关系。

七、对明星的身份认同也衍生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体验，相关研究出现在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含义》（1979）对电影中女同性恋问题的关注，理查德·戴尔《神圣的肉体：电影明星和社会》对明星在男女同性恋者心目中地位的考察。

以上几种研究范式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来的几种表征明显的西方学术界有关明星研究的理论路向。^① 其实很多时候，譬如明星研究的奠基者理查德·戴尔一样，其方法论与角度呈现出一种综合的、发展的状态。

^① 相关论述见李启军博士论文《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

相对而言，国内的明星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尽管对明星现象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就已出现，但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一直到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重建阶段，明星研究仍然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八九十年代随着商业电影的兴起和对电影本质属性讨论的逐步深入，作为电影工业基本构成元素的明星制才真正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多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引述和阐释，而很少有自己的理论独创，同时也缺乏在中国电影明星专题研究方面的实践应用。回望历史，1926 年的《明星论》^① 或许是我们能看到的有关明星的最早论述。文章指出电影明星的成名有赖于影片公司和演员个人利用媒介进行的炒作和宣传。出现于 30 年代的郑君里的《影迷与“明星制”》^② 也是早期中国明星研究的典范，它们分析了明星对于观众的巨大影响力，以至于观众只见明星、不见其他，忘却了观影的完整性，同时对影星的疯狂追捧也有可能妨碍电影事业的良性发展。在专门著述方面，30 年代出现了周世勋编写的《世界电影明星小史》（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出版公司 1931 年版）和李离年编写的《中国电影演员小史》（上海中华文化出版公司 1934 年版）。这两部著述开创了中国电影明星研究的史传体先河，但是资料零星，不成体系，更多的是个人兴趣，缺乏理论辨析。这种史传体的研究范式一直持续到了 90 年代，如沈寂主编的《老上海电影明星》（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0 年版），郭华编著的《老影星·老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年版），朱天纬、王珍珍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年版），张骏祥、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 年版），周观武著的《民国影坛风云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朱剑、汪朝光编的《民国影坛纪实》（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肖果编著的《中国早期影星》（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值得一提的是，1993 年高小康的《大众的梦——当代趣味与流行文化》一书的出版多少改变了明星研究理论匮乏的局面，在这本主要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尽管只有一个章节涉及明星的符号和象征作用，却开启了从理论视角介入明星研究的先河。

与上述专著相比，80 年代以来有关明星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从刊发时间和批评理论上可以看出对西方明星研究理论范式的吸收和借鉴过程。90 年代

① 载 1926 年明星公司特刊第 7 期《电影女明星》。

② 载千秋出版社 1934 年 9 月出版的《影迷周刊》“创刊号”。



以后《世界电影》和《电影艺术》等重要电影理论刊物上陆续刊译了数篇有代表性的西方明星研究学者的文章，对国内学术界的明星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角度和方法。^①在业界，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对中国电影界建立明星制的呼唤与理论探索。如黄健中的《明星和明星制》、谢飞的《重要的是要改革》和贾磊磊的《电影明星制、明星崇拜与商品拜物教》等。进入21世纪后，沉疴缚身的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制度变革，作为电影产业核心构成的明星制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2003年与2008年分别掀起两次研究高潮。刘浩东的《明星制与电影产业》、邱章红的《形象与资本：好莱坞电影工业明星制剖析》和陈鸿秀的《明星制：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等文章成为其中的代表。2008年《当代电影》发起博士论坛，对明星制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有丁亚平的《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等。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在这一年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对当代中国电影明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而一些青年学者也以明星研究为课题，进行了学位论文的撰写。在对中国电影女明星的专门研究中，更多的是借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一群体进行关照，在时间上也更多集中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中国电影和新中国电影十七年时期这两个大的历史时段上。

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了以几位华裔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研究热。专著方面有李欧梵的《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这本书开启了国内研究早期电影文化的一种新思路，影响颇大。张英进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一书内容涉猎也比较广泛，其中部分章节涉及民国电影与女性形象问题。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美国学者斯蒂芬森（Shelley Stephenson）对李香兰现象的专论《她无处不在：上海、李香兰和大东亚电影圈》，分析了上海电影杂志中捧红李香兰的策略与从无到有的“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李香兰现象本身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侵略模式。这对本书的相关论述颇有启发。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台湾学者周蕙玲的《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以及张真的文章

^① 1990年《世界电影》刊发R·德·科尔多瓦的《美国明星制度探源》一文；1992年《电影艺术》上发表了罗伯特·C·艾伦的《明星：电影史中的角色》大大开拓了国内明星研究的理论视野；1995年《世界电影》杂志刊登了美国电影理论家R·科尔多瓦的《明星制的起源》和《论明星》两篇文章；2001年《世界电影》刊载的保罗·麦克唐纳的《重新认识明星现象》；2004年这本刊物再次刊发了理查德·戴尔的《明星现象学》；2007年又刊发了斯蒂芬·海纳曼的《明星文化》。

《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都是有关中国电影与文化现代性、女明星身体表演与视觉政治等命题的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限于学术沟通的不畅和话语场域的阻隔，一些有益的专著文章在国内只能通过辗转的介绍渠道约略了解，同时在治史方法与理论思路上，尽管西方的相关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和理论启示，但是有些观点和方法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电影的史实和现状。

在众多的理论范式中，本书作者最终选择以身体理论来关照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电影女明星问题，从论题角度的新颖性来说在此前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本书可以看作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同时也兼容了其他研究理论和方法。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电影女明星的发生、发展和存在方式与好莱坞有很大不同，所以具备充分的研究可能性和研究价值。但是一百年来，在电影产业方面，成熟的电影明星制度却一直没有成功建立起来，而在理论探讨方面，与西方学术界完备的明星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相关理论研究也处于初创阶段。

聚焦中国电影百年中的身体政治与电影女明星这一命题，不难发现，其中有着比西方相关研究更加复杂的历史和情势。中国电影女明星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时间上与好莱坞明星制度的确立保持同步。然而明星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却相对滞后。原因来自几个方面，早期中国电影多为民族资本的自发选择，持续动荡的时局也不可能形成像好莱坞那种大工业体系下稳定的明星制度的空间；文化传统的规训也使被目为倡优之行、通俗情节剧叙事的电影产业长期停留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匮乏的理论关照大都将目光投注在电影技术与艺术的维度，少之又少的有针对性的明星个案研究也多停留在“史传体”与“娱乐新闻”的层面上。如1935年由著名摄影师陈嘉震主编的《中国电影女明星照相集》与其姊妹篇《中国电影明星大观》以30年代电影明星所属公司分类，收录了包括明星、联华、艺华、天一和新华等13家电影公司旗下的众多电影明星的各种生活照和剧照。除此之外，1949年之前共有多达七百多种专业电影杂志、报纸和各种大报的副刊，以及众多上海小报成为有关电影明星话语的滋生地。二三十年代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生活类杂志《良友》和女性杂志《玲珑》等也多以电影女明星作为话语对象。这一时期的明星研究与美国早期明星研究如出一辙，都停留在弗兰克·E. 伍兹的“史传体”阶段上。而上海小报的明星报道则开创了延续至今的有关电影明星的八卦、绯闻的娱乐报道先河。



《中国电影女明星照相集》封面与封底

1949年，中国电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工农兵美学的时代新风貌抵牾的旧上海电影明星们开始了洗心革面的改造过程，期盼以符合新时代审美观的形象融入新的社会体系。在这一来自身体和精神意识的双重改造过程中，身体政治中的社会性极度凸显，完全遮蔽了明星话语的性别意识与个性魅力。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换，祛除了环绕在明星身上的炫目光环，世俗神话被彻底打破。来自解放区的、继承了30年代左翼电影美学风范的革命女性成为银幕上新的视觉中心。她们或以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面貌出现，或以革命战争中的女革命者为解放事业而呐喊，或者作为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亟待拯救的弱势群体出现，或者作为民族自新的领路人或献祭者，成为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一时期有关电影演员的报道在数量上大幅缩水。与广大工农兵相比，艺术工作者不过是因为革命分工不同而存在的一个普通群体，一切民间的有关偶像崇拜的东西无论在故事中还是在银幕下，都是被禁止的。作为演员的个体成为影片中正面角色的代言人，个体终于融入集体主义的大家庭中，镁光灯下不再有耀目的明星闪现。政治性压倒一切的新中国电影自然不会为作为电影产业制度基础的明星制提供生存空间。与早期中国电影庞杂的电影宣传阵地相比，新中国电影的前十七年和“文革”中，电影宣传与明星塑造完全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范畴。硕果仅存的只有《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寥寥几家专业电影杂志。各种报刊上的电影话语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先声。从“造星”机制上看，创办于1950年的《大众电影》杂志充当了这一时期的明星温床，它的封面照和内文介绍性的图片和文字，是人们了解电影台前幕后故事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而由这本杂志举办的影片评选活动创始于1962年，“文革”前共举办过三届。也是在1962

年，文化部征集了四大电影厂的意见，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审核下，评选出了“22大明星”。作为入选的明星个人，大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现自己成了被“上级”评选出来的明星。同一年中的两次造星运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内中国电影明星制的绝唱，不久这些入选的明星，与那些更广大的没有入选的明星们都没能逃过十年浩劫的狂飙，“文革”十年中国电影处于停滞期，意识形态斗争和频繁的政治运动往往以电影为突破口，于是电影人首当其冲地成为历次运动的牺牲品和代罪羔羊，不仅名誉一败涂地，不少人还身陷囹圄，或者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从改造到重生再到毁灭，中国电影明星步履维艰。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种种束缚也开始松动，电影创作的空间和自由度越来越大。从80年代末商业电影的勃兴到90年代中期对电影本质属性的讨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属性终于被确定下来，由此建立中国大电影产业的命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89年《中国电影周报》组织评选出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十大电影明星”，1993年第二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又进行了“首届十大影视明星”的评选。作为中国电影八九十年代的代言人，陈冲、刘晓庆身上体现出浓厚的时代烙印。无论是陈冲还是刘晓庆，她们在银幕上的相貌与形体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意旨，而在现实生活与媒体塑造中却呈现出典型的崇尚个人主义的现代主义气息。属于90年代的巩俐却呈现出与陈冲、刘晓庆相反的矛盾状态：电影中富于反抗精神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被压抑的女性形象与巩俐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的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人生选择。进入新千年后，随着一系列电影政策的松绑，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1949年以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定位被打破，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影视制作环节成为可能。在资本的调配和票房的考量下，中国电影银幕上的身体呈现日趋泛亚洲化、国际化，中国电影女明星也纷纷走出国门，开始吹响了向好莱坞进军的号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新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女明星章子怡。从出道时的“小巩俐”到走上国际影坛的“玉娇龙”，瘦弱纤细的章子怡身体空间早已越过了国界，而由她引发的争议也不再是仅限于银幕的话题。关乎身体政治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命题在这里分外凸显。

本书的框架结构基本上按照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来安排，并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女明星身体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将百年历史归纳为三大时段：早期中国电影女明星，新中国电影十七年与“文革”电影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女明星。第一章概述了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影像问题。第二